

进城农民工多维度贫困异质性特征

——以广东省佛山市为例

钱颖妍, 罗蔚翹, 方铭嘉, 温 慧, 王成超, 徐 丹

(佛山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 广东 佛山 528225)

摘要: 基于广东省佛山市进城农民工的 300 份调研问卷数据, 采用 AF(Alkire-Foster)法研究农民工多维贫困特征, 从空间异质性和群体异质性视角阐释进城农民工多维贫困异质性特征。研究结果显示: 在空间异质性方面, 居住在城中村的农民工在生活质量和工作状况维度上贫困发生率低于城乡结合和城郊区域, 城郊区农民工多维贫困最为严重; 在群体异质性方面, 职业技能水平较低的体力工人和普通工人在收入与资产、教育与技能、生活质量和和工作状况维度上的贫困发生率显著高于职业技能水平较高的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 各维度贫困发生率随学历提高而逐渐降低, 小学及以下学历的农民工多维贫困发生率和强度最高。最后, 基于研究结果提出治理政策启示。

关键词: 进城农民工; 多维度贫困; 空间异质性; 群体异质性

中图分类号: F332.6; F323.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1807(2025)07-0171-08

作为城市化进程中的关键群体, 农民工在享受城镇化机遇的同时, 仍面临教育、住房、收入等多维困境, 影响其生活质量和社会融入, 阻碍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因此, 探讨农民工多维贫困的空间和群体异质性, 对于精准施策、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随着贫困研究的深入, 学者们提出了“贫困异质性”概念, 主要从代际、职业、教育水平和空间差异等方面进行阐释。在代际差异上, 传统农民工倾向于返回农村, 而新一代农民工则希望长期居住在城市, 渴望城市社会的认可与接纳^[1], 维权意识强, 更注重自身的发展^[2]。在职业选择上, 传统农民工不在乎工种, 新一代农民工倾向于体面、有尊严的职业^[1]。在职业差异方面, 不同类型职业的多维贫困特征各异。体力劳动者收入相对较高, 但由于劳动强度大、环境恶劣及危险性高, 其生活质量和健康状况受到影响, 多维贫困问题仍然严重^[3]。由于受教育水平等方面的差异, 管理人员和专业人

员的收入水平高于普通工人和服务人员^[4], 技术工人的工作稳定性也高于普通工人^[5]。在教育水平差异方面, 教育能有效促进农民工收入增长和就业质量, 农民工学历越高, 收入越高, 就业市场竞争优势越大^[6]。在空间差异方面, 学者们研究发现中国整体呈现出多维相对贫困状况普遍严峻的区域分布特征^[7], 其中, 东部地区农民工的贫困程度明显优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低-低集聚型城市主要集中在中部和西部地区, 区域之间的多维贫困状况存在显著分化^[7-8]。以往的农民工贫困研究为未来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 但仍然存在以下不足: 一是空间异质性研究主要从大尺度流入地比较, 缺乏对微观尺度流入地的比较; 二是农民工群体异质性研究主要聚焦单一收入贫困维度, 缺乏多维贫困视角; 三是在研究区域方面, 主要聚焦中西部地区和华北、华东地区, 缺乏对粤港澳大湾区这一农民工典型流入集聚地的案例研究。针对上述不足, 本文以广东省佛

收稿日期: 2024-09-08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2171284);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20YJCZH112, 22YJCZH199); 广东省社科项目(GD23CGL02); 广州市社科基金(2022GZYB20); 2023 年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术基金(xsjj202310zsa02); 2023 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202311847035); 2024 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202411847014)

作者简介: 钱颖妍(2003—), 女, 广东佛山人, 研究方向为乡村地理学和区域可持续发展; 罗蔚翹(2002—), 女, 广东江门人, 研究方向为乡村地理学和区域可持续发展; 方铭嘉(2003—), 男, 广东湛江人, 研究方向为乡村地理学和区域可持续发展; 温慧(2003—), 女, 福建龙岩人, 研究方向为乡村地理学和区域可持续发展; 王成超(1979—), 男, 山东临沂人, 博士, 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乡村地理学和区域可持续发展; 通信作者徐丹(1982—), 女, 江西抚州人,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与 GIS 应用。

山市为例,基于农民工问卷调查,从空间异质性和群体异质性视角阐释进城农民工多维贫困异质性特征。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问卷调查。数据获取分为 3 个阶段:2023 年 4 月的预调研,2023 年 6—7 月在禅城区、南海区和顺德区的正式调研,以及 2023 年 9 月在水三区和禅城区的补充调研。为了确保样本的代表性和结果的可靠性,研究团队采用了简单随机抽样法和访谈式调研方法。问卷内容涉及农民工的个人情况、家庭背景、就业状况和生活质量等。共发放了 311 份问卷,筛选后有效问卷为 300 份,有效问卷率为 96.46%。

1.2 研究方法

1.2.1 多维贫困测度方法

采用 Alkire 和 Foster 所创立的“双界限法”测度农民工多维贫困。第 1 层界限为识别个体在单个维度上是否被剥夺;第 2 层界限为判断个体是否处于多维贫困状态,具体为剥夺的维度数是否超过设定的 k 值。根据此思路,先计算多维贫困发生率再计算平均剥夺份额,得到多维贫困指数为

$$MPI(k) = H(k)A(k) = \frac{q}{n} \frac{\sum_{i=1}^N c_{ij}(k)}{q} \quad (1)$$

式中: H 为多维贫困发生率; q 为多维贫困人口; n 为总人口,体现了贫困广度; A 为平均剥夺份额; $c_{ij}(k)$ 为个体 i 在不同维度 k 下被剥夺的指标数量,体现了贫困深度; MPI 为多维贫困指数。最后对多

维贫困指数进行分解,指标贡献率公式为

$$C_j = \frac{G_j CA_j}{MPI} \quad (2)$$

式中: G_j 为指标 C_j 的权重; CA_j 为第 j 指标被剥夺的人口率。

1.2.2 多维贫困测度指标选择与说明

结合前人研究和本土实践调查情况,选取收入与资产、教育与技能、住房状况、生活质量、工作状况 5 个维度 13 个指标衡量佛山市进城农民工多维贫困状况。权重设定采用等权重方法^[9]。收入是传统上衡量贫困的典型指标,资产作为一个家庭多年的收入积累和消费平滑后的财富状况的反映^[10],因此设立收入与资产维度。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是反映人力资本水平的经典指标,构成教育与技能维度;就业和住房作为农民工向市民转化的关键^[11],住房状况选取人均卧室数量、住房支出、住房环境;生活质量维度选取农民工在城市住所的耐用消费品数量和人均生活支出两个子维度;工作状况维度选取了工作时间、工作强度、轮班制度、工作风险性 4 个子项,最终构建农民工城市多维贫困识别体系(表 1)。

2 农民工多维度贫困异质性分析

2.1 佛山市进城农民工多维度贫困测度结果

首先根据已有研究^[12],采用联合国 MPI 指数建议的多维贫困临界值 $k=0.33$ 进行多维贫困识别,结果见表 2,根据本文构建的农民工的城市多维贫困识别体系,当 $k=0.33$ 时,佛山市进城农民工多维贫困发生率为 81%。

2.2 不同居住地农民工测度结果比较分析

为探究不同居住地农民工多维贫困状况是否存

表 1 测度指标体系和剥夺临界值及权重

维度	指标	指标的剥夺临界	权重
收入与资产	收入	月收入低于 2021 年佛山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times 平均就业者负担人口的 60% (6 180 元)赋值为 1,否则为 0	1/10
	资产	没有拥有商品房和自建房现价低于 30 万元以上赋值为 1,否则为 0	1/10
教育与技能	受教育程度	未完成义务教育(即教育年限低于 9 年)赋值为 1,否则为 0	1/10
	专业技能	没有拥有专业技能(厨师、理发、电工、电焊、木工等)赋值为 1,否则为 0	1/10
住房状况	住房支出	月租金低于 2021 年佛山市城镇居民人均居住支出的 60%(530 元)赋值为 1,否则为 0	1/15
	人均卧室	扣除未满 10 岁未成年子女人数后人均卧室小于 1 赋值为 1,否则为 0	1/15
	住房环境	住房周边环境吵闹、脏乱、不安全赋值为 1,否则为 0	1/15
生活质量	耐用消费品	居住地拥有常用的耐用消费品(彩电、冰箱、热水器、空调、电脑、油烟机、洗衣机、电磁炉、小汽车)数量小于 3 赋值为 1,否则为 0	1/10
	人均生活支出	小于等于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平均值(每个月 2 066 元)赋值为 1,否则为 0	1/10
工作状况	工作时间	平均每周工作时间大于等于 48 h 赋值为 1,否则为 0	1/20
	工作强度	工作强度取值高于 2 赋值为 1,否则为 0	1/20
	轮班制度	工作需要轮班(白班/夜班/三班轮替)赋值为 1,否则为 0	1/20
	工作风险性	高空作业、有毒或严重异味、高粉尘、强噪声、操作不当危险或其他高风险,满足其中 1 项赋值为 1,否则为 0	1/20

注:工作强度中体力型认定为无须体力或轻微体力工作=1,中度体力=2,高度体力=3,强度体力=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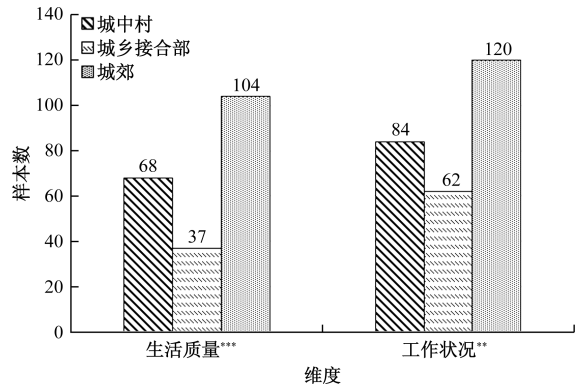
表 2 多维贫困测度结果

贫困临界值 k	贫困发生率 $H\%$	平均掠夺份数 $A/\%$	多维贫困指数 MPI	人数
0.1	100.0	49.5	0.495	300
0.2	96.3	50.9	0.490	289
0.3	85.3	54.2	0.463	256
0.33	81.0	55.5	0.449	243
0.4	70.0	58.5	0.410	210
0.5	51.7	63.5	0.328	155
0.6	31.7	69.0	0.218	95
0.7	13.0	76.5	0.099	39
0.8	3.0	85.9	0.026	9
0.9	0.7	90.0	0.006	2

在差异,基于前人研究和实践调查,将样本农民工按居住地分为城中村(101份)、城乡接合部(65份)、城郊区域(134份),如图1所示。样本中大部分农民工租住当地人私房中,一部分居住在工厂宿舍,少部分居住在社区公寓。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生活质量、工作状况的显著性水平小于0.05,拒绝零假设,因此不同居住地类型农民工在生活质量和工作状况维度上存在差异。

2.2.1 不同居住地农民工单维度贫困发生率

从贫困发生率(图2)显示,城中区农民工在这两个维度上的贫困发生率低于其他区域。原因可能是城市发展和地租提升导致大型重工业迁出,取而代之的是劳动强度和风险较低的轻工业。此外,城中区样



、*分别表示 $P < 0.05$ 、 $P < 0.01$

图 1 不同居住地类型下维度均值

本职业类型多样,商业活动频繁,提升了生活质量。城乡接合部区域在工作状况维度上的贫困发生率较高,主要因该区域处于城市建成区边缘,建筑工程多,样本多为从事高强度、高风险工作的建筑和物流工人。城郊区域的生活质量贫困发生率最高,原因是该区域多为工厂集中区,交通不便,农民工多居住于多人宿舍,耐用消费品少,远离市区导致休闲娱乐设施匮乏,人均消费支出少,生活质量差。

2.2.2 不同居住地农民工多维贫困特征

(1)城郊农民工发生多维度贫困范围广、程度深、强度最大。不同 k 值下 3 类居住地农民工的多维贫困指数分解结果(表3)显示,随着贫困临界值 k 值的增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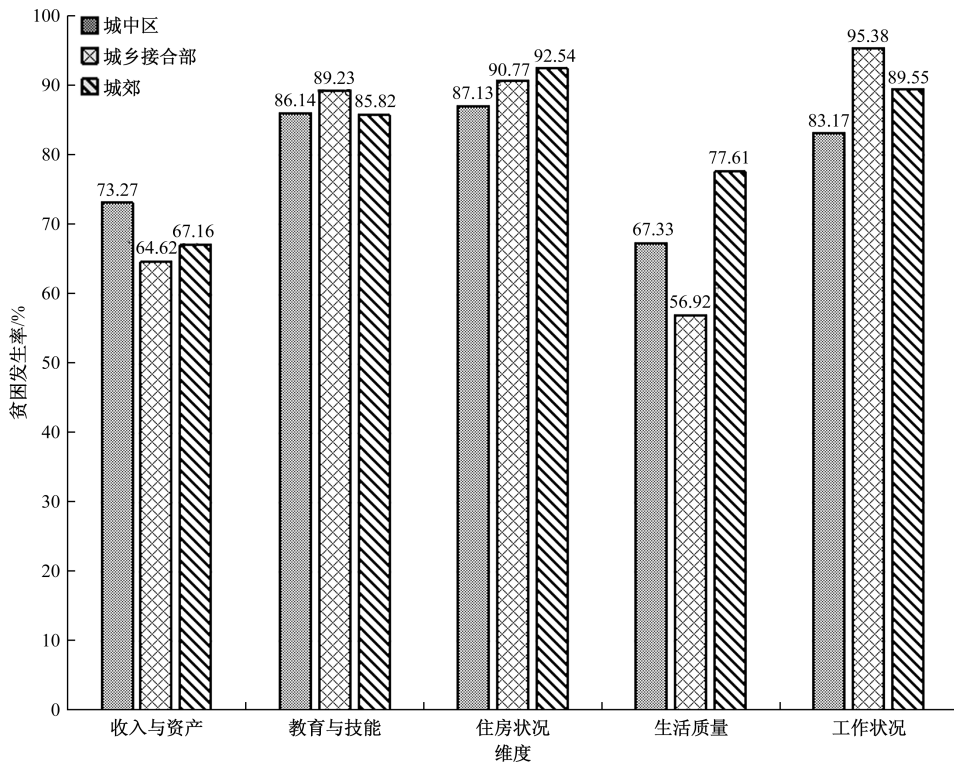


图 2 不同居住区农民工维度贫困发生率

表 3 不同居住地农民工多维贫困特征

贫困临界值 k	多维贫困发生率 $H/\%$			平均剥夺份额 A			多维贫困指数 MPI		
	城中村	城乡接合部	城郊	城中村	城乡接合部	城郊	城中村	城乡接合部	城郊
0.1	100.00	100.00	100.00	0.488	0.464	0.516	0.488	0.464	0.516
0.2	96.33	95.38	97.01	0.503	0.480	0.527	0.483	0.458	0.511
0.3	84.16	80.00	88.81	0.539	0.523	0.553	0.454	0.419	0.491
0.33	80.20	76.92	83.58	0.550	0.532	0.568	0.441	0.409	0.475
0.4	70.30	56.92	76.12	0.577	0.590	0.589	0.406	0.336	0.448
0.5	48.51	46.15	56.72	0.636	0.627	0.637	0.309	0.289	0.361
0.6	29.70	21.54	43.28	0.693	0.715	0.681	0.206	0.154	0.259
0.7	12.87	12.31	13.43	0.754	0.767	0.771	0.097	0.094	0.104

H 值和 MPI 不断减小,而 A 值不断上升。当 $k \geq 0.1$ 时,城郊农民工的多维贫困发生率最高,其次为城中村,最后为城乡接合部。城郊农民工的多维贫困广度和 A 值均最大, MPI 始终最高,表明城郊农民工的多维贫困程度最广、最深、强度最大。

(2)城乡接合部的贫困群体部分贫困程度较浅,少数贫困程度较深。城乡接合部农民工的多维贫困发生率最低。随着 k 值从 0.33 增加到 0.4,贫困发生率减少 20%,高于城中村的 9.9%和城郊的 7.46%,减幅和减速均优于其他两个区域,表明城乡接合部的部分贫困群体贫困程度较浅。然而,当 $k=0.6 \sim 0.7$ 时,尽管贫困发生率最低,但 A 值接近 0.7,显示城乡接合部的少数贫困群体剥夺程度严重,贫困程度较深。

(3)城中村的农民工发生多维度贫困的可能性较大,少部分贫困程度较深。当 $k \geq 0.1$ 时,城中村农民工的多维贫困发生率仅次于城郊,显示城中村农民工发生多维贫困的可能性较大。 k 值达到 0.6 时,多维贫困发生率降至 29.7%,远低于城郊的 43.28%,但平均剥夺份额 A 接近城郊,表明城中村仍有部分农民工贫困程度较深,需要得到关注。

2.3 不同职业农民工测度结果比较

为探究不同职业农民工多维贫困状况是否存在差异,基于样本农民工实际就业情况,将职业划分为 5 种类型:普通工人(76 份)、技术工人(65 份)、管理人员(35 份)、体力工人(52 份)和其他(72 份)(图 3)。普通工人指从事流水线等低技术含量工作的农民工;技术工人指从事电力、机械等技术工作的农民工;管理人员指工厂主管、店长等;体力工人指从事建筑、物流仓储搬运工作的农民工;其他类包括以上分类以外的职业。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收入与资产、教育与技能、生活质量、工作状况的显著性水平小于 0.05,应拒绝零假设,表明不同职业类型的农民工在这些维度上存在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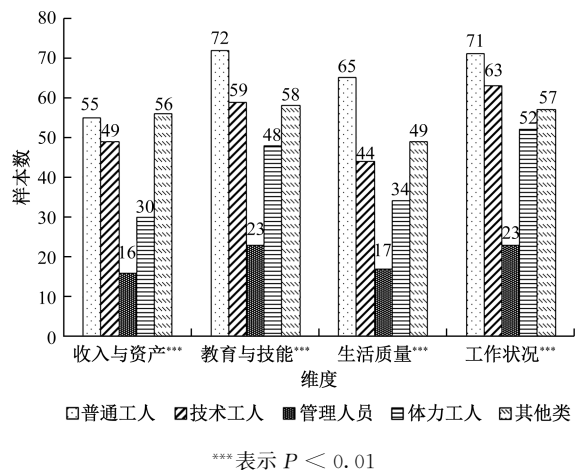


图 3 不同职业类型下维度均值

2.3.1 不同职业农民工指标贫困发生率

如图 4 所示,不同职业类型农民工在收入与资产、教育与技能、生活质量和工作状况维度上存在差异。技术工人与普通工人因技能优势不明显、技术含量不高、工作环境相似等情况在上述维度中贫困发生率差异不显著,相较于其他职业类型,教育与技能、工作状况等多个维度贫困发生率较高。其次,包括建筑工人和物流仓储运输工人在内的体力工人在收入与资产维度贫困发生率较低但其他维度贫困特征突出,由此可见体力工人的 3 大特征:一是工作环境恶劣,夏季面临高温环境,且工作强度高、工作风险性大;二是住房条件差,主要居住在工地临时搭建的简易仓房;三是文化水平较低,主要从事体力工作。最后,管理人员相较于其他职业,多个维度贫困发生率最低。

2.3.2 不同职业农民工多维测度结果比较

(1)体力工人与普通工人发生多维度贫困的可能性最大。在不同 k 值下对 5 类职业农民工的多维贫困指数进行分解(表 4),随着贫困临界值 k 的增大, H 和 MPI 不断减小,而 A 不断上升。具体来说,当贫困临界值 $k=0.1$ 时,各类职业农民工的贫困发生率为 100%。当 $k=0.2$ 时,体力工人的多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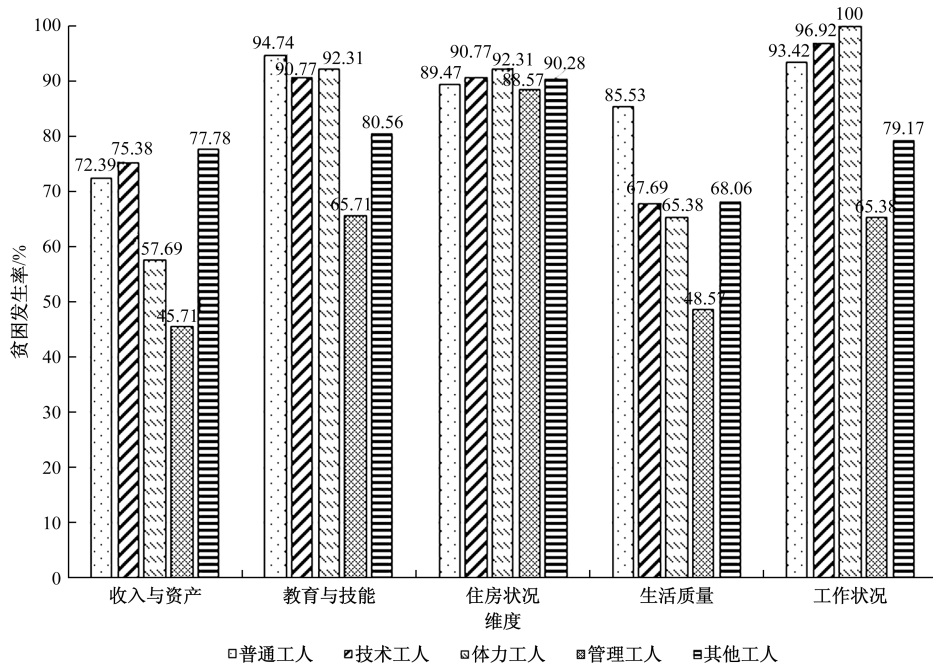


图4 不同职业农民工的贫困发生率

表4 不同职业农民工多维贫困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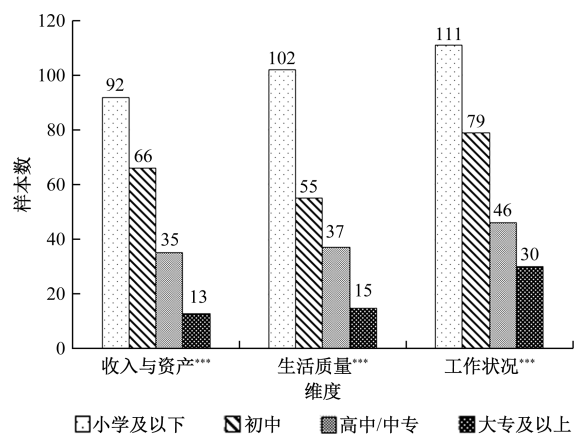
贫困临界值 k	多维贫困发生率 $H/\%$					平均剥夺份额 A					多维贫困指数 MPI				
	其他工人	普通工人	技术工人	体力工人	管理工人	其他工人	普通工人	技术工人	体力工人	管理工人	其他工人	普通工人	技术工人	体力工人	管理工人
0.1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0.547	0.516	0.540	0.334	0.467	0.557	0.516	0.540	0.334	0.467
0.2	98.68	96.92	100.00	85.71	95.83	0.552	0.528	0.540	0.364	0.483	0.545	0.511	0.540	0.312	0.462
0.3	97.36	92.30	90.38	48.57	80.56	0.556	0.540	0.570	0.457	0.527	0.542	0.498	0.515	0.222	0.425
0.33	92.10	87.69	86.54	45.71	76.39	0.571	0.552	0.581	0.466	0.539	0.526	0.484	0.503	0.213	0.412
0.4	84.21	78.46	71.15	34.29	63.89	0.591	0.574	0.629	0.501	0.575	0.497	0.450	0.448	0.172	0.367
0.5	65.78	55.38	59.62	8.57	48.61	0.632	0.627	0.668	0.617	0.617	0.415	0.347	0.398	0.053	0.300
0.6	39.47	33.85	40.38	5.71	27.78	0.688	0.671	0.726	0.633	0.678	0.271	0.227	0.293	0.036	0.188
0.7	14.47	10.77	25.00	0.00	11.11	0.774	0.750	0.780	0.000	0.737	0.112	0.080	0.195	0.000	0.081

贫困发生率最高; k 介于 0.3~0.5 时,普通工人的多维贫困发生率最高; k 介于 0.6~0.7 时,体力工人的多维贫困发生率再次成为最高。

(2)体力工人与普通工人多维度贫困的强度最大,体力工人贫困程度最深。从平均剥夺份额来看,当 $k \geq 0.3$ 时,体力工人的平均剥夺份额最高,其次是普通工人、技术工人、其他工人和管理人员。这表明体力工人最容易陷入深度贫困,普通工人次之。在多维贫困指数方面,随着 k 增大,体力工人与普通工人的多维贫困指数交替位居首位。由此可见,体力工人与普通工人的多维贫困强度最大。管理人员多维贫困可能性最小、贫困程度最浅。

2.4 不同受教育程度农民工测度比较分析

如图5所示,为探究不同受教育程度农民工多维贫困状况差异,将样本农民工按受教育程度分为4类:小学及以下(120份)、初中(85份)、高中或中



***表示 $P < 0.01$

图5 不同受教育程度下维度均值

专(56份)、大专及以上学历(39份)。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收入与资产、生活质量、工作状态维度上显著性水平小于 0.05,应拒绝零假设。因此,

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农民工在这些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

2.4.1 不同受教育程度农民工指标贫困发生率

根据维度贫困发生率的数据分析结果(图 6), 总体来看,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多个维度的贫困发生率逐渐降低。具体而言,低学历者,如小学及以下和初中学历者,因技能不足,缺乏优势,其在收入与资产、生活质量和和工作状况等维度上发生率较高,常陷低收入、低资产、低质量的困境,从事高风险工作,生活拮据;而高学历者,如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则凭借教育优势,获得更高的薪资、更优的工作条件及完善的社保福利,贫困发生率大幅降低。

2.4.2 不同受教育程度农民工多维测度结果比较

(1)小学及以下学历与初中学历农民工是多维

贫困可能性最高的群体。对不同 k 下 4 类受教育程度农民工多维贫困指数进行分解(表 5)。随着贫困临界值 k 的增大, H 和 MPI 不断减小,而 A 不断上升,但多维贫困程度存在差异。具体而言,当贫困临界值 $k=0.1$ 时,各类受教育程度农民工贫困发生率为 100%;而当 $k=0.2$ 时,小学及以下农民工贫困发生率最高。

(2)小学及以下农民工发生多维贫困的强度最大。表 5 显示,从多维贫困指数 MPI 上看,不管 k 如何变化,小学及以下的多维贫困指数始终位居首位。若以 $k=0.33$ 为贫困界限,小学及以下农民工多维贫困发生率 H 、平均剥夺份额 A 、多维贫困指数 MPI 均是最高的地区,由此得出结论,小学及以下的农民工多维贫困发生的强度最大,而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农民工多维贫困的强度最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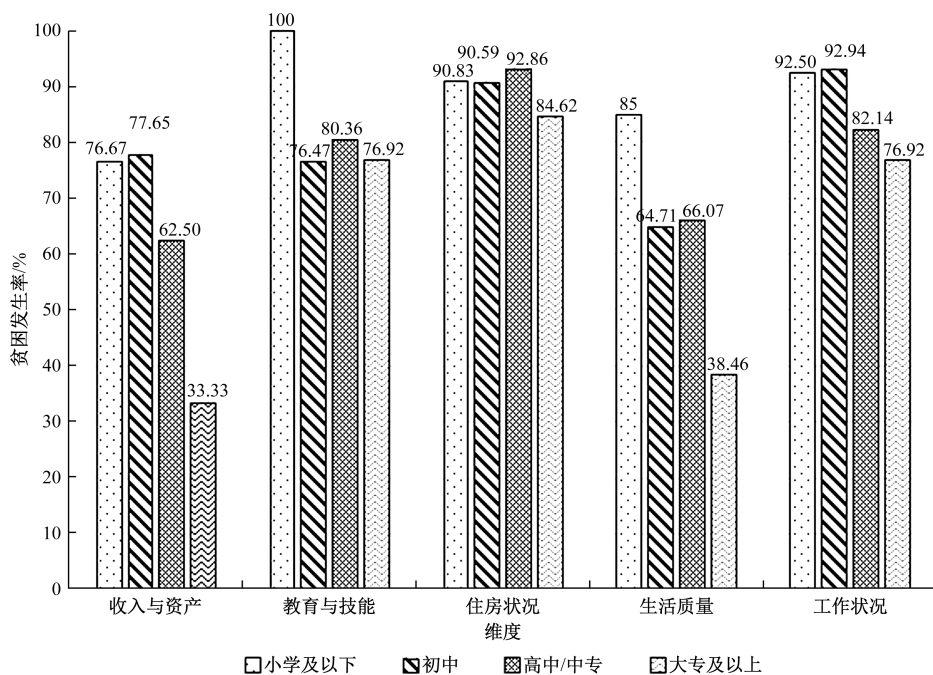


图 6 不同教育程度农民工的贫困发生率

表 5 不同受教育程度农民工多维贫困特征

贫困临界值 k	多维贫困发生率 $H/\%$				平均剥夺份额 A				多维贫困指数 MPI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中专	大专及以上学历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中专	大专及以上学历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中专	大专及以上学历
0.1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0.615	0.460	0.419	0.314	0.615	0.460	0.419	0.314
0.2	100.00	96.47	94.64	87.18	0.615	0.472	0.435	0.339	0.615	0.455	0.412	0.296
0.3	99.17	87.06	76.79	51.28	0.618	0.494	0.478	0.408	0.613	0.430	0.367	0.209
0.33	96.67	83.53	71.43	41.03	0.626	0.502	0.490	0.431	0.606	0.419	0.350	0.177
0.4	93.33	68.24	57.14	20.51	0.636	0.534	0.521	0.504	0.593	0.365	0.298	0.103
0.5	82.50	41.18	32.14	7.69	0.661	0.596	0.574	0.572	0.546	0.245	0.185	0.044
0.6	58.33	20.00	12.50	2.56	0.709	0.644	0.621	0.600	0.414	0.129	0.078	0.015
0.7	30.00	3.53	0.00	0.00	0.769	0.717	0.000	0.000	0.231	0.025	0.000	0.000

3 结论与讨论

根据佛山市进城农民工的 300 份调研问卷,借助 AF(Alkire-Foster)多维贫困测度方法,深入探讨不同居住地、不同职业、不同受教育程度之间贫困状况的差异性和特征,得到以下结论。

(1)在空间异质性方面,居住在城中村农民工在生活质量和工作状况维度上贫困发生率低于城乡结合部和城郊区域,城郊农民工发生多维度贫困范围广、程度深、强度最大。这一研究结论与袁媛等^[13]的研究不一致,由于社会主义转型国家与体制相关的各种空间政策共同作用,导致了城市贫困和剥夺在内城区重合、外围区分离,个体数据和空间分析均呈现内城区经济条件和生活状况方面的双重不利复杂状况。这一结论与慈勤英和张芳^[14]、甘满堂和王岩^[15]的研究结论大致相似,城中村改造与房地产扩张迫使农民工移向城郊村,形成贫困聚集地。城市贫困向城乡结合部与远郊扩散,加剧了社会不平等。

(2)在群体异质性方面,职业技能水平较低的体力工人和普通工人在收入与资产、教育与技能、生活质量和工作状况维度上的贫困发生率显著高于职业技能水平较高的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从事制造业等行业的普通工人和技术工人多面临低薪、长工时、差环境及低技能等问题,多维贫困风险高。建筑业体力工人虽工作环境恶劣、加班频繁,但收入相对制造业等职业较高。上述结论与徐友全和温雪梅^[3]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3)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农民工在收入与资产、生活质量和工作状况维度的贫困发生率逐渐降低。小学及以下学历的农民工多维贫困发生率和强度最高。这一研究结论与胡宏伟等^[16]一致,低于初中学历(含)的农民工在整体群体中占比较大,同时,根据经典人力资本理论可知,人力资本的提升是获得更高经济收入的必要条件,提升教育是增强农民工人力资本的关键,进而提高收入,稳定岗位,增加报酬,优化生活与工作质量,最终降低多维贫困。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以下相关政策建议:
①根据不同区域、不同职业、不同受教育程度的贫困特征,扶贫政策应该有所区别,在政策公平性的原则下,城郊地带、普通工人和体力工人、小学及以下和初中学历的农民工应得到扶贫政策的优先考虑。
②针对农民工问题,建议改善工作环境,如增

设空调,落实高温补贴;加强安全保障,特别是高风险岗位;提升薪酬待遇,改善生活质量;严格执行加班费政策,保障合法权益。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工福祉。
③加大对农民工教育培训的投入,提供免费或低成本学习机会,推广成人与职业教育,增强其职业素质与人力资本,打破简易劳动力工作局限,为农民工增加就业与收入,提升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 [1] 柳建平,魏雷. 两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因素及差异分析[J]. 软科学, 2017, 31(2): 38-43.
- [2] 杜书云,张广宇. 农民工代际差异问题调查与思考[J]. 农村经济, 2008(2): 100-104.
- [3] 徐友全,温雪梅. 建筑业农民工产业工人化转型的影响因素分析[J]. 陕西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3, 39(3): 79-87.
- [4] 李强,熊美. 农民工职业获得与职业工资差异分析[J]. 农业经济与管理, 2016(2): 55-66.
- [5] 王浙勤,陈瑶,罗彬. 中小制造业农民工劳动技能与从业稳定性关系研究[J]. 农业技术经济, 2012(11): 100-108.
- [6] 肖小勇,黄静,郭慧颖. 教育能够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吗?基于CHIP外来务工人员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2): 135-143.
- [7] 贺坤,周云波. 精准扶贫视角下中国农民工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比较研究[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8, 39(2): 42-54.
- [8] 高云虹,刘津铭. 中国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的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4, 58(2): 224-233.
- [9] 王青,刘烁. 进城农民工多维贫困测度及不平等程度分析:基于社会融合视角[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0, 37(1): 83-101.
- [10] 王小林. 贫困概念的演进(一)收入和消费贫困[J]. 中国扶贫, 2011(22): 30-31.
- [11] 成德宁. 我国进城农民工的居住问题及其解决思路[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8(4): 78-84.
- [12] ALKIRE S, SANTOS M E. Measuring acute poverty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robustness and scope of the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J]. World Development, 2014, 59(1): 251-274.
- [13] 袁媛,吴缚龙,许学强. 转型期中国城市贫困和剥夺的空间模式[J]. 地理学报, 2009, 64(6): 753-763.
- [14] 慈勤英,张芳. 城市贫困空间固化的社会治理研究[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7, 38(3): 1-5.
- [15] 甘满堂,王岩. 农民工住居边缘化与空间隔离:从城中村到城郊村[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8(1): 123-126.
- [16] 胡宏伟,童玉林,曹杨. 受教育水平对新生代农民工收支均衡的影响[J]. 经济经纬, 2012(1): 112-116.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Heterogeneity for Rural Migrant Workers: The Case of Fosha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QIAN Yingyan, LUO Weiqiao, FANG Mingjia, WEN Hui, WANG Chengchao, XU Dan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Planning, Foshan University, Foshan 528225,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survey data from 300 migrant workers in Foshan, Guangdong Province, the AF(Alkire-Foster) method was used to examine the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characteristics of migrant workers. It explains the heterogeneity of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from both spatial and group perspectives. It is found that migrant workers living in urban villages have lower poverty incidence rates in the dimensions of quality of life and working conditions compared to those in urban-rural junctions and suburban areas in terms of spatial heterogeneity, with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being most severe in suburban areas. In terms of group heterogeneity, physical laborers and ordinary workers with lower skill levels have significantly higher poverty incidence rates in the dimensions of income and assets, education and skills, quality of life, and working conditions than skilled workers and managers with higher skill levels. The poverty incidence across various dimensions decreases as education levels increase, with migrant workers having primary school education or below experiencing the highest incidence and intensity of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Finally,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governance are proposed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Keywords: rural migrant workers;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spatial heterogeneity; group heterogeneity